

南京政府崩潰探索



编者的话

本期增刊系由江苏省中国现代史学会供稿。该学会于1986年11月3日至7日在无锡市召开了“解放战争史学术讨论会”，全省90多位史学工作者参加了会议。还邀请上海、武汉、新疆等地的一些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著名学者夏东元教授也应邀到会，并作了学术报告。

会议收到论文70余篇，作者从抗战胜利后出现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大决战的形势出发，对这一时期国共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了讨论，并分别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以及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展等方面，对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崩溃原因进行了分析、探讨。这些文章运用了一些新资料，提出了若干新的学术观点。

省中国现代史学会举办解放战争史学术讨论会还是首次，为了交流研究成果，学会从收到的论文中选出38篇，编辑成册，现由我部出增刊。

本期增刊由张圻福、姜志良、姜平、孙宅巍、苏仲波、徐梁伯六位同志负责编辑初审，最后由我部进行终审，并作了技术性处理。由于时间匆促和我们水平所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广州大学学报编辑部

1987年1月

目 录

| | | |
|---------------------------|---------|-------|
| 抗战胜利后党争取中国社会“和平改革”的一次大胆尝试 | 王 河 | (1) |
| 略论抗战胜利后党对时局的估计与方针的确定 | 吴其全 | (15) |
| 向南发展中我党解决干部问题的战略 | 牟国义 | (24) |
| 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结晶 | | |
| ——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建立 | | |
| | 张永通 陈惠芳 | (35) |
|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的反美蒋斗争 | 姜 平 | (47) |
| 论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主同盟 | 汤宝一 | (61) |
| 民盟苏州地下支部创办的《光明报》 | 马新民 | (75) |
| 我国各民主党派共同创办的新型大学 | | |
| ——香港达德学院始末初探 | 孙士正 | (82) |
| 略论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的政治危机 | 王建玲 | (93) |
| 东吴师生“反内战、争民主”运动与反蒋第二条战线 | 杨恒源 | (102) |
| 解放战争时期全国的妇女运动 | 高秋萍 | (111) |
| 从“行宪国大”看国民党统治的危机 | 陈谦平 | (120) |
| 从马歇尔的调处看美国对华政策 | 张圻福 韦 恒 | (133) |
| 略论解放战争时期苏联的对华政策 | 顾莹蕙 | (143) |

| | | |
|-----------------------------|---------|----------|
| 论鲁西南战役 | 冯 治 | (154) |
| 国民党在平津会战中之失败 | 丁永隆 | (163) |
| 淮海战役中首歼黄百韬兵团述略 | 张建奎 | 张士杰(174) |
| 淮海战役中的起义与投诚述评 | 种衍奎 | 程佩璇(181) |
| 渡江战役前国民党二八二师的起义 | 杨东野 | (190) |
| 回顾上海战役 | 王楚英 | (196) |
| 陈诚军事集团的崩溃 | 马 烈 | (209) |
| 浅论陈仪的起义及其被害 | 江君謨 | (220) |
| 李达等在湖南和平解放中的作用 | 宋镜明 | (227) |
| 新疆“九·二五”起义成功的原因 | 殷东保 | (239) |
| 略论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国民经济的总崩溃 | 古静如 | (248) |
| 金元券与国民党政权的崩溃 | 韩 森 | (257) |
| 试论银元券 | 孙宅巍 | (268) |
| 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通货膨胀 | 姚 能 | (280) |
| 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垮台的经济原因 | 徐兆银 季金根 | (289) |
| 解放战争时期无锡的两次抢米风潮 | 朱昱鹏 | (296) |
|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如何利用无锡米市 搜刮军粮 | 冯 炬 | (305) |
| 江苏解放战争概述 | 姜志良 | (312) |
| 苏中七战七捷的辉煌胜利 | 鲁荣顺 | (323) |
| 解放战争中的“三打”李堡 | 范崇山 陈振东 | (333) |
| 盐城战役述略 | 曹晋杰 陈肇彦 | (342) |
| 江苏解放区的妇女运动 | 冯月华 黄晓勤 | (345) |
| 人民群众对苏中战役的支援 | 朱子文 | (351) |
| 南京人民迎接解放的斗争 | 吴玉璋 | (355) |

抗战胜利后党争取中国社会 “和平改革”的一次大胆尝试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 王 河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曾认为中国“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①。1956年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刘少奇同志在政治报告中回顾说：当时我们党多次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以图避免内战，“并且试图经过和平的道路实现中国社会的政治改革”^②。对此，由于已往的种种原因，致使史学界对党在这一时期绚丽多彩的斗争历史缺乏研究。本文试作粗浅的探讨，以求教于史学界。

抗战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依据国内外有利的形势，针对当时斗争的复杂情况，提出了争取和平民主的总方针，即和平改革的道路。

抗战结束了，虽然中日民族矛盾这个曾经制约国共斗争的因素已经消失，但国内外又产生出一些新的因素，制约着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使其还不可能马上爆发为全面大规模的内战。从国内看：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有一亿人口的解放区，一百万正规军，二百万地方武装，并有了一定的国际地位。这使得蒋介石不敢轻易发动内战。第二，国民党统治区觉

① 《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1945年8月25日。

②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04页。

悟的人民和以民主同盟为代表的各民主党派反对内战，这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是一种牵制。第三，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不赞成内战。国民党内除了宋庆龄、何香凝、李济深、冯玉祥等民主派外，“邵力子、王世杰、张治中以及政学系的张群和于右任等”，也都不主张打内战^①。从国际上看：抗战结束前后，由美国牵头，美英苏三大国多次举行会议，在对华政策方面达成妥协，一致表示战后中国应维护团结统一，实行民主改革，反对中国再打内战。美英苏三国的对华政策，特别是美国反对中国再打内战的态度，不能不使蒋介石有所顾忌。纵观国内外这些制约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因素，就给中国的前途带来了和平民主的可能性。

由于上述历史条件，便使得当时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出现了复杂的局面。首先，蒋介石在抗战一结束就向我党发起了“和平攻势”。1945年8月，蒋介石连续三次打电报邀请毛泽东同志赴重庆“和平谈判”。毛泽东同志说过：只要国民党“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而不是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②。不管蒋介石出于什么动机选择了和平斗争方式，当时中国共产党没有必要非选择战争的方式回答他。其次，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8年抗战中始终没有退出抗日阵营，因而“在中国人民中间，主要是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中间，还有相当多的人相信蒋介石”^③。当时，广大的人民群众只是渴望和平民主，还没有彻底推翻国民党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愿望。中国共产党是执行人民意志、依靠人民力量的政党，它的方针政策，既要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又要适应人民群众觉悟的程

① 《中央通报》1946年2月7日。

②③ 《毛选合订本》1964年版第106页第113页。

度。抗战结束后，和平民主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国共产党在制定自己斗争的战略策略时，不能不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这种愿望。

鉴于上述原因，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行动纲领”，是“行将到来和平建国时期的总方针”和“基本口号”^①。8月26日，中共中央又对党内发出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指出：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败下去；可能在谈判后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②。从此，争取和平民主就成了这个时期指导中国革命的总方针，中国共产党大胆选择了非暴力合法斗争的方式，即通过和平改革来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革命道路。

中国共产党选择的和平改革的道路，具体说，就是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这和在“七大”毛泽东同志《论联合政府》的报告的路线是一致的。联合政府的建立，将使中国具有民主共和国的性质。列宁曾经指出：恩格斯的一个“基本思想，这就是，民主共和国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③。联合政府的成立，将使中国具备和平改革的最基本的条件。在联合政府的组织形式下，可以通过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的提高，通过争夺领导权的反复斗争，以和平方式逐步废止地主大资产阶级及支持他们的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走向新民主主义社会。总之，无论是武装斗争还是和平改革，党都是沿着“七大”的路线把中国引向

① 解放日报社论：《新时期的路标》1945年8月28日。

② 《毛选合订本》第105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224页。

光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法国工人阶级提出把选举权由统治者“欺骗的工具”变成劳动者的“解放工具”，这一口号得到了恩格斯的肯定^①。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美国推动国民党建立联合政府，目的是要通过联合政府这个“欺骗的工具”来遏止中国革命。然而，中国共产党却要利用联合政府来进行合法斗争，通过和平改革来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把联合政府变成中国人民的“解放工具”。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形式拘泥为只能从事武装斗争。列宁说过：“至于变革的形式、方法和手段，马克思既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也没有束缚未来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的手脚”^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总的趋势是美英法与苏联之间的妥协，是“经过和平协商达成协议”^③，虽然相互之间一直在“争吵”，但“中心是向着和平、民主、繁荣的路上去”^④。”在这个前提下，当时世界上有“多少国家修改了宪法，多少国家改组了政府，多少国家进行了普选”^⑤。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改革”的大胆尝试，也是利用了这一有利的世界民主进步的历史潮流。

二

如上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曾经努力争取走和平改革的革命道路，然而，中国共产党在这条道路前进的过程中，却表现出自己独特的马克思主义风格。

首先，中国共产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以斗争求和平，绝不向反动派乞求和平。

经历了长期革命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与代表大地主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2页。

② 《列宁选集》第511页。

③ 《毛选合订本》第1080页。

④⑤ 周恩来：《在重庆大学生爱国运动会上的演讲》1946年2月7日。

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的分裂和联合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出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原则。在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依然坚持这个原则，通过斗争，迫使国民党蒋介石接受人民和平民主的要求，而不是幻想蒋介石会发善心，会自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针对着蒋介石要抢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毛泽东同志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在重庆谈判期间，中国共产党以革命的两手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两手；在华北铁路交通战役中，我军站在自卫的立场上给来犯蒋军以迎头痛击。总之，由于中国共产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大大增强了和平的可能性，使中国有可能不用武力而“用协定的方法避免内战^①”。

其次，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总方针，是建立在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基点上、即自力更生的基点上。

中国共产党提出争取和平民主的总方针，虽然有其有利的国内外诸因素，但也有其不利的一面，即国民党反动派已经确定了内战、独裁、卖国三位一体的反动政策。针对国民党这一反动政策，唯有作坚决的斗争才能制止其内战独裁，实现和平民主。而要使斗争达到制止内战的目的，“一个条件，要有力量”，只有把“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内战就可以制止”^②。毛泽东同志在七大的政治报告、《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等讲演、报告以及起草的有关文件中，反复强调要领导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独裁。1946年2月政协会议闭幕后，在中国和平民主一度即将成为现实的时刻，毛泽东同志还表示：“我们必须以全部信仰寄托于人民，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抵御的”^③。他把政协会议的胜

① 毛泽东：《对英国记者甘贝尔十二项问题之答复》1945年10月9日。

② 《毛选合订本》第1049页。

③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3日。

利，看成是人民力量的胜利。虽然中国共产党在策略上曾经争取过美国政府，利用美国与国民党蒋介石之间的分歧作为制止中国内战的一个因素，但是，无可否认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力量作为争取和平民主的可靠依据。

第三，在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运用了革命统一战线的锐利武器，争取团结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使他们成为我党反内战反独裁的同盟军，使自己在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

抗战结束之后，一部分民主人士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先后建立了一批新的民主党派，他们中有些人虽然对国民党蒋介石抱有一些幻想，但他们反对内战，希望中国从此走上和平建国的道路；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一党专政、个人独裁，希望中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因此就使得中国共产党和他们有可能结成统一战线。1946年1月政协会议期间，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民主党派的代表（主要是民主同盟）联合起来，共同抵制维护国民党蒋介石实行专制独裁的“五五宪草”，在起草宪法时写上：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其职权相当于民主国家的议会；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有同意权和否决权，可以否决行政院的措施；监察院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行使同意、弹劾与监察权；省为地方最高自治单位，得制定省宪法等条款。这些规定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制度，并在法律上使解放区新民主主义制度得到保障。另外，中共代表和民盟代表还联合提出并通过了一些决议条款，如“国民政府所讨论之议案，其性质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者，须有出席委员三分之二始得通过”，“宪法的通过，须经出席代表四分之三的同意”等，均使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同盟联合起

来，在即将成立的联合政府中对国民党具有了否决权。因此，政协决议实质上是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决议，政协会议是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会议，它推动中国向和平民主的方向前进。中共代表与民盟代表的联合提案虽然与英国的议会制、内阁制很相似，“与我们的新民主主义还有很长的距离，但如照政协做下去，则是向新民主主义的方向发展”，“政协的路线就是毛泽东同志《论联合政府》的路线^①”。如果政协决议后来不被蒋介石撕毁而真正实现了，那么中国从此就走上了和平民主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改革的可能性就将成为现实。

第四，中国共产党在争取和平改革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自卫战争的准备，始终没有放弃人民武装。

在美国导演下，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举行和平谈判，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其主要目的是要诱使中国共产党交出自己的武装。然而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斗争中懂得了一个真理：在中国，离开了革命武装，“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②。因此，重庆谈判后，毛泽东同志斩钉截铁地告诫全党：“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③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共产党虽然当时尽力争取和平，但中共中央也看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存在着和平与战争两种可能性，因而并没有放弃自卫战争的准备。政协会议之后，中共中央虽曾一度认为“中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议会斗争”，并且决定九个月后“党将停止对部队的直接指示”^④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56页。

②③ 《毛选合订本》第573、1059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1946年2月1日。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要放弃自己的武装，所以中共中央在作出这一决定时指出：“军队中的党员仍然保留党籍，各级军政干部仍留原部队服务，政治工作必须加强”，用这些办法使人民武装“取得合法地位”而保留下，并“丝毫不改变我们军队为人民军队的本质”，决定各解放区大练兵三个月①很显然，中国共产党即使认为和平的合法斗争已经成为革命的主要形式，但仍充分利用各种合法途径把人民武装保存下来。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在德国共产党内部，恩格斯一方面批判以恩斯特为代表的拒绝“合法斗争”和“议会斗争”的“左”倾机会主义，另一方面又批判了以福尔马尔为代表的“完全放弃暴力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在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应采取灵活的革命的两手的策略，即以和平革命和暴力革命相结合、合法手段与不合法手段相结合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在准备以和平方式为主要斗争形式时，没有放弃革命武装，是符合恩格斯的这一策略思想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当时欧洲走和平过渡道路的共产党一个根本性的区别。中国共产党没有把和平方式和武装斗争两种革命形式绝然对立起来，没有把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和平方式的革命斗争上，而完全放弃了武装斗争，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把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在准备以和平方式为主要斗争形式的同时，仍设法把自己的武装力量保存下来，作为和平改革的可靠后盾，并便于在最终“决战”时能夺取政权。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于和平形式和武装斗争两种革命方式的深刻理解和正确运用。

总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政治舞台的斗争风云，如同苍云天狗、变幻莫测，时而和谈，时而战争；一时间和平民主似乎根本不可能，一时间战争的双方又达协议，和平民主似

①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1946年2月1日。

乎指日可待，然而随后又战端复起。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极其复杂的条件下，没有简单地接受斯大林同志的意见：解散自己的军队，参加蒋介石政府^①，而是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出自己独特的风格，使党在这一时期革命斗争的历史光彩夺目、绚丽多姿，并通过这一斗争历程，团结了民主力量，教育了人民，暴露了反动派的真面貌，推迟了大规模内战的爆发，加速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三

1946年1月10日，毛泽东同志亲自签发了停战令，指出“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中共中央当时曾认为，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狭隘的关门主义”，指出：“党内外许多人不相信内战真能停止，和平真能实现，不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在各方面逼迫之下，也能实行民主改革，并能继续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到来，因而采取怀疑态度，对于许多工作不愿实际的认真的去做，不愿学习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形式”^②。无须讳言，中共中央当时是在战争与和平的前途估计上发生了短暂的偏差，“过高地估计了美国政府遵守莫斯科三国会议决议的可靠性，以至过高地相信了蒋介石的诺言”^③。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不可能在工作中不出现一点点错误或偏差。中共中央只能够依据当时的客观情况对前途作出判断，确定自己的方针。而“中央当时估计和平的可能也确有许多根据”^④。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1946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叫嚷撕毁政协决议，东北四平保卫战又暴露了马歇尔“调处”的背后是支

① 杰米耶夫：《铁托传》下册第118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1946年2月1日。

③ 《解放日报》1946年8月16日。

④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55页。

持蒋介石，因此于5月份中共中央就改变了原来对和平前途的估计，并向全党指出：国民党蒋介石“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各解放区要进一步掀起大练兵的高潮，充分作好全面自卫战争的准备^①。由于中共中央对时局前途估计上出现偏差的时间很短，而且始终没有放弃人民武装，没有放弃自卫战争的准备，因而也没有给革命事业带来什么损失。

“和平的愿望能否实现，却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当时的统治阶级”^②。中国革命和平改革的可能性的丧失，主要原因有两点：其一，国民党蒋介石顽固坚持内战独裁的反动立场；其二，美国政府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必然导致中国大规模的内战。

抗战一结束，国民党蒋介石就确定了内战独裁的方针，只是迫于国内外诸因素的制约，不得不“用各种迂回的方法消灭中共”^③。在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密令各战区大量印发蒋介石过去亲自编辑的所谓《剿匪手本》。《双十协定》签定后的第三天，蒋介石颁发了“剿匪”密令，命令国民党部队按照《剿匪手本》，对解放区“努力进剿”。政协会议前后，一方面国民党特务大打出手，连续制造一二一惨案、沦白堂事件、较场口事件；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队不断进攻解放区，造成“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1946年6月，国民党虽然签定了“东北停战协定”，但却集中兵力在关内进攻各解放区，挑起了全面内战。总之，蒋介石在他进攻有利的时候，便决不停战；在他进攻失败、需要取得时间，整顿军队，以便重新进攻”的时候，“他便赞成停战，举行所谓‘和谈’”^④。中国共

① 《中共中央关于练兵的指示》1946年5月。

②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05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60页。

④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66页。

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实践再一次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人民没有起码的民主权利，“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革命的主要形式只能是武装斗争^①。恩格斯曾经指出：“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按照宪法意志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②。然而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只知道实行封建法西斯专制统治，这就从根本上使中国革命失去了和平改革的可能性。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民主进步的力量战胜了法西斯主义。而中国的统治者，却逆世界民主进步的历史潮流，拒绝作丝毫民主化改革，顽固坚持封建法西斯专制统治，因而使中国共产党无法走和平改革的革命道路。

国民党蒋介石是美国在华殖民利益的代理人，因而美国政府对国民党蒋介石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战后美国政府错误的对华政策，是导致中国全面内战的极其重要的原因。

第二位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政府认为其对华政策面临三种抉择：一是完全摆脱，完全从中国撤出；二是国民党既腐败无能，又不得民心，没有能力战胜中国共产党，美国只有大规模军事干涉，直接出兵帮助国民党才能够击毁中共军队；三是一方面努力使国共双方妥协，避免内战、成立联合政府，另一方面又积极援助国民党蒋介石，使其在联合政府中占主导地位。权衡利弊，美国政府认为只能采取第三种抉择^③。当时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对中国各派力量的估计与其政府不同。他认为蒋介石“装备精良的师团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共军”^④。这

① 《毛选合订本》第507页1964年版。

② 《马恩全集》第22卷第273页。

③ 《美国与中国关系》上卷第8页。

④ 《赫尔利和蒋介石会谈备忘录》1945年2月16日。

无疑助长了蒋介石的内战气焰。赫尔利露骨的扶蒋反共政策与其政府对华政策相悖，因此于1945年11月被解除大使之职，离开了中国。美国政府决定由原美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以总统特使的身份赴华，“调处”国共之间的军事冲突。马歇尔积极推行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他确实曾多次批评蒋介石，要他停止内战，与共产党谋取妥协，实行一些民主化改革，成立联合政府。马歇尔并曾经直率地向蒋介石表示，中国不实现和平统一，将得不到美国的经济援助^①；如果国民党挑起内战，军事上的失利和随之而来的经济混乱将会使国民党遭到失败，“会替共产主义造成良好繁殖的基础”^②。但是，另一方面，马歇尔又积极援助蒋介石，帮助国民党从海上或空中运输大批军队到东北、华北，并用大约15亿美元的军事物资装备了国民党45个师，另外又向国民党政府赠送军舰271艘，还把价值8亿多美元的飞机、汽车、交通器材及其他军用品作为战后剩余物资送给蒋介石。美国政府还向国会提议延长对华租借法案十年，以及向蒋介石提供贷款等等。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内战独裁政策的批评，虽曾一度对蒋介石发动内战起了遏止作用，但是狡猾的蒋介石终于看出了美国政府有两个矛盾的对华政策：一是劝蒋停战，一是不断地给他大量的军事援助，“因此他毫不踌躇地接受了美国的大炮而轰走了美国的鸽子”^③。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中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本来就是无法调和统一的，它的失败破产是必然的；给国民党蒋介石大量军事援助的结果，只能是纵容和支持其发动内战。

马歇尔不仅是美国对华政策的牺牲品，也是这一政策的制

① 《马歇尔使华》第30页。

② 《美国与中国关系》上卷第140页。

③ 《解放日报》1946年8月14日。

订者和推行者。1945年12月马歇尔赴华之前，曾经向杜鲁门总统、贝尔纳斯国务卿提出：假设蒋介石坚持要打内战，国共两党之间的“调处”失败了，美国政府“仍有必要通过我继续支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国民党政府）^①。马歇尔的这一提议，得到了杜鲁门和贝尔纳斯的首肯。1946年11月，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了可耻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使中国进一步沦为美国的殖民地。这彻底地暴露了美国政府为了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才决心把扶植国民党政府作为它对华政策的基本点。尽管国民党政府那样腐败无能、不得民心，而且又拒绝和平民主，挑起全面内战，马歇尔仍要代表美国政府支持它。直至1948年4月，在国民党政府即将垮台的前夕，马歇尔作为国务卿在参众两院有关委员会讨论时还表示：美国将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②。马歇尔自诩为热爱和平民主，但他却站在帝国主义立场上，始终把美国统治集团的利益和腐败的国党反动派系在一起，把自己的政治声誉和民心丧尽的蒋介石系在一起。马歇尔来华“调处”初期，曾经给渴望和平民主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他也确实得到过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合作”^③。但事隔不久，马歇尔自己抛弃了“公正”的立场，袒护国民党蒋介石，成了中国内战的实际支持者。马歇尔来华一年之后，在中国人民掀起的反美反蒋浪潮中悻悻离开了中国^④，这是中国历史前进的必然结果。

俄国在1917年4月至6月，曾经出现了和平斗争的可能

① 《马歇尔使华》第9—10页。

②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300页。

③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208页。

④ 马歇尔离华前夕，因美军士兵强奸北大一名女学生而在全国兴起了反美抗暴运动。